

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

张伟然 著



中华书局

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

张伟然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张伟然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0

ISBN 978 - 7 - 101 - 10200 - 0

I. 中… II. 张… III. 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 -
文化地理学 - 文集 IV. I2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2086 号

-
- 书 名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著 者 张伟然
封面题签 徐 俊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920 × 1250 毫米 1/32
印张 12½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 - 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200 - 0
定 价 49.00 元
-

前 言

一、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思维传统

关于文化的研究有三种取向：从学理上探讨其知识体系，这是文化学；从时间维度探讨其历时变迁，是为文化史；从空间上研究其地域差异，即为文化地理。如果将文化史和文化地理的研究结合起来，那便是历史文化地理。它要求在探讨文化变迁的同时展现其空间差异，或者说在考察文化空间差异的同时揭示其历时状况。这是由历史、文化、地理三个坐标轴构建而成的一个三维研究领域。

作为科学术语，“文化”、“地理”的现代概念都是舶来品。文化地理的学科体系也是从域外输入的。但我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度，其传统知识体系中并非没有与“文化”大体相当的概念^①，也并不缺乏关于文化地域差异的思考。只是其思维方式与西方相形异趣。

^① 个人感觉，在中国传统概念中，与西文 Culture 更接近的概念其实是“风俗”。

在中国，“文化”往往包含着价值判断，意味着某种发展程度。一提起文化的地域差异，传统的意识首先是“别华夷”。《左传》成公四年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设若是王化同风，那便要比较各地文化水平之高下，诸如所出文化人物多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占地位如何，等等。三国时北人袁淮说：“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②正是这一观念的生动说明。此外虽然也会注意到乡俗的不同，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往往也要评鹭其美恶。例如祠祀有正、淫，方音有正、讹，风俗有淳、漓，地方有善、互，都是同一观念的逻辑延伸。

而在西方，“文化”更多地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由于缺乏可资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审视文化的地域差异主要便在于类型的区别。如语言和宗教，各地文化形态从谱系上可区分出亲疏远近，却无法评判其高下优劣。尽管历史上一度出现过将非欧洲民族的文化一律视为野蛮落后的殖民主义倾向，但总体观之并非主流。

这种观念差异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数千年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使得人们在文化上形成了强烈的定于一尊的远大理想。尽管事实上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从来就不曾消弭于无形，但古往今来都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想状态，属于理当整齐之列。自秦始皇“书同文”到当代的规范语言文字，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明初的文化革命乃至民国的“新生活运动”，一直都有贯彻这一文化观念的具体措施。

而西方则大相径庭，各种文化在彼此接触时都极力标榜其自身的独特性，以致有些地方其文化形态本来不构成类型差异，也被人为地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26，第1901页。按，本书尽量用简注形式，引用典籍及专业参考著作，其版本信息一律见书末主要参考文献；叙述所及、统计所需者，以及征引论文，则仅随文注出。

② 《三国志》卷4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第122页。

标榜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尽管它们之间交流并没有太多的障碍,却经常被人为地加以区分^①。更极端的例子出现于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之间,由此引发出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少“语言”之间的距离其实还不如汉语中的某些“方言”。

这种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学当中,便是关注的内容迥然不同。西方的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文化类型的地域分殊,其中最重要的是种族(或曰族群)、语言和宗教,旨在别其同异。而在中国,一个本能的兴趣便是关注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即对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乃至文化设施进行量化分析,要在较其高低。民国时期曾兴起一股研究地域文化的热潮,其中有不少涉及文化地理。如丁文江受梁启超影响曾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此文产生了极广泛影响^②;贺昌群亦有《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之作^③。而明确提出某地文化的便有江浙、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西藏、新疆、黑龙江等省区,其中福建还发行过《福建文化》一刊。

建国以后,人文学科的研究被中断了三十年。1979年人文地理学

① Ronald Wardhaugh: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p.28.

②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载《科学》第8卷第1期,1923年,第10—24页。此文流布极广,近已收入多种丁氏文集,如欧阳哲生主编之《丁文江文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及朱正编注之《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此文发表后,1924年初傅斯年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中对此有所评论,后以《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为题揭载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第221—225页。傅氏此文亦流布甚广,近已收入其多种文集,如朱正编注之《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及黄振萍、李凌已编《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初刊《大公报》“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1936年11月3日。此文转载甚多,见《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178页。

复兴,作为其中主要分支的文化地理学也迅即得到发展,此时优先受到关注的仍是文化发展水平的问题。从台湾引进的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其中与文化地理直接相关的仅一篇,该篇题为“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受陈氏此书刺激,各类人物以及著作、出版、藏书分布的研究风起云涌,综合性的文化地理著作也大多将这一问题当作重要研究内容。或小而言之,曰“人才地理”、“人物地理”;或大而化之,称“教育地理”;或综以观之,名以“学术文化地理”,不一而足。显然都是这一思维传统的逻辑延续。

二、从文化水平、文化面貌到地理感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陆地区曾兴起一波文化热。与建国前研讨文化的风气有所不同,此时无论从思考深度还是从观察广度都大有拓展。1986年,谭其骧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中以高屋建瓴之势提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努力方向。他指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可是“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①。

谭先生此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他正指导卢云写作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卢云的工作包括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大块,其中,学术这一块主要是对当时各地所出人物、书籍进行分类统计分析,而宗教、婚姻、音乐的内容则是对汉晋时期这几种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迁予以复原。该

^① 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又见《长水集续编》,第171—188页。

论文于1987年通过答辩,后正式出版。到1990年,鉴于卢著是一项全国范围的断代研究,谭先生希望看到一个对称的做法,又指导笔者以湖南、湖北为空间范围,做一个区域性的通代研究。考虑到这一研究的工作量太大,当时学术界又缺乏成例可依,在资料收集完成后,笔者仅将湖南部分的资料撰写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于1993年通过答辩。

继谭先生之后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周振鹤先生。早在1986年,他和游汝杰先生合著了《方言与中国文化》,该书包含相当分量的历史方言地理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稍后,他又发表《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文^①,为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协助谭先生指导笔者完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工作后,他继续指导学生开展以省区为单位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出版陕西、浙江、河陇等多部专著^②。与此同时,他个人也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③。1997年,他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组织起来,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此书迄今仍受到关注。

与谭先生同为历史地理学巨匠的史念海先生也很早对历史文化地理有着浓厚兴趣。早在1980年,他就撰写了《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④。稍后,他又发表了《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

① 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88页。

②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李智君:《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③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7页;《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第60—68页。

④ 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71—630页。后收入《河山集》五集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气的溯源》^①、《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②两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论文,展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视野。他很早意识到宗教地理的重要性,指导学生开展了多项佛教地理研究^③。他的高座弟子郭声波教授也指导学生开展了藏传佛教地理的研究^④。

除了上述,蓝勇先生出版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胡阿祥先生则独辟蹊径,推出了《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此外,司徒尚纪先生先后出版了《广东文化地理》、《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等书,还指导张力仁、朱竑分别完成了对河西走廊、海南岛的文化地理研究^⑤。司徒先生及其学生的这些工作虽然未冠以“历史”之名,但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属性,加之司徒先生素来的历史地理背景,这些工作基本上也可视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只不过其时段下限已延伸至现当代。

笔者从硕士时开始研习历史文化地理,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地理^⑥。读博后,承谭其骧先生指示,开始思考文化地域综合体、文化区域等级系统等问题。可惜刚开始收集论文资料,谭先生便一病不起,次年竟驾鹤归西,以致对他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构想领会很有限。尽管他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无论

① 初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25—50页。后收入《河山集》五集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② 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③ 辛德勇:《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载《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306页;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④ 王开队:《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

⑤ 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

⑥ 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第225—241页;1992年第1辑,第219—245页。

文字还是口头论学中,但通过不断反思他平常说过的一些只言片语,笔者自感博士论文可能并未实现他的学术理想。

毕业后,经过两年多时间消化,笔者于1996年集中精力开展湖北部分的研究。刚开始时并没有太多新的想法,只是不想简单推广湖南部分的工作。当方言、民居、聚落、太岳朝香、佛教、女性文化景观等专题探讨逐一完成,渐次要考虑湖北综合性的文化区域时,一个过去不曾碰到的问题浮现在心头。

做历史地理研究有一门功课,着手之前得把研究范围内的政区沿革梳理一遍。1991年夏初,笔者遵谭先生之命将两湖的政区沿革爬梳了一过。当时就感觉,湖北历代的政区变化异常复杂。做过了湖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之后,笔者对政区与文化区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长期稳定的政区往往就是某种文化区的间接表现。因此,考虑综合性的文化区划,完全可以从政区设置入手,至少可寻出不少有益的线索。至此,笔者发现,湖北历代的政区变迁虽然杂,却不乱。自三国以后,历朝都想将它分属不同高层政区,可是怎么分都不对,变来变去,到明朝只好又回到汉朝的老路,将它与湖南合起来设一个湖广省。这才奠定今湖北省的大致境域。中间左分右分,分了千余年,到最后还是要合起来,这是为什么?

笔者想到了文化的力量。自汉以降,历代文人墨客一到江汉之间便吟咏起楚,江汉间人也一直以楚人而自居,从不以当时的政区设置为转移。由此可见,江汉之间存在着一个基于文化感知而存在的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导源于楚,一直在起作用。于是,笔者撰写了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①。

① 载《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85页。又见拙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找到这个思路令笔者异常兴奋,回想谭先生生前的耳提面命,自以为他一个很奇妙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大约 1991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笔者循例去他家汇报一个月左右的学习进展,谈话中他猛然问了一句:“你看资水是属于湘水的,还是属于沅水的?”笔者从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也不知他究竟想问什么,思索片刻,试探性地回答说:“应该是属于湘水的吧?”他点点头,说:“对,我也觉得资水是属于湘水的;澧水是属于沅水的。”然后他又继续往下说:“襄阳在历史上本来是属北方、属中原的,但是慢慢地发展到南方来了。做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应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当时笔者还在王静安先生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为学第一境界,对于谭先生的思路完全跟不上,因而听了谭先生这番话根本没办法往下接。只是隐约意识到,这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极重要提示,因为类似的阐述从未在其他那里听到过(之后也没有)。博士论文做到最后,笔者就湖南的历史文化提出了一个综合区划方案,其中一级区是将湖南划分为湘资区、沅澧区两个大区^①,等于将谭先生关于资、澧二水文化归属的感觉给出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但是,关于襄阳文化归属由北而南的问题,却长期找不到下手的头绪。时过九年,不期然找到感觉文化区这个概念,并将它在湖北历史上的表现作了一番梳理后,蓦然发现,谭先生上述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学术直觉似即在是。

那段时间还有另一个工作。同事张晓虹在研究太白山信仰的地域扩展,我们相互讨论多次后,合作发表了一篇《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②。该文以现代气象学知识为背景,分析古人在太白山祈雨所以

① 张伟然:《试论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载《地理学报》第 50 卷第 1 期,1995 年,第 59—65 页。又见拙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② 张晓虹、张伟然:《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2000 年,第 197—205 页。

能成功的原因；从而认为，古代关中人选择在太白祈雨，其实是受到其环境感知的驱动。当地人早就注意到太白山降雨所需的基本条件，从而在祈雨仪式中包含有创造降雨条件的内容。唯其如此，太白山神被认为非常灵验，以致太白庙在关中扩散得比西岳华山庙还普遍。此文颇有助于说明，在古代中国这么高度人文化的国家，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采取了人文而非科学的路线，可是就实际效果而言，两者往往殊途同归。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自发地走上科学的道路，应该不是能力而只是兴趣、思维习惯的问题。

从分析文化发展水平到复原历史文化面貌，再到探讨地理感知、文化认同，这里面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的产物。

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学术构想

将本书内容作为一本专著，是笔者近年在一些师友刺激下产生的想法。各章节的写作则各有因缘，前后绵延十四年。

书中最先产生写作念头的是第二章“《柳毅传》中的‘洞庭’”。1991年春，笔者在研读洞庭湖历史变迁的论文时注意到，柳毅传书的洞庭湖实为太湖。于是写了一篇札记，并在向谭其骧先生汇报学习进展时说及此事。谭先生起先不在意，当听说在中古时期洞庭湖、君山，太湖、洞庭山两处湖山均名“洞庭”后，很感兴趣，当即指示：“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放到一个通大路的刊物上去发表，——不过，现在不许做，要等到你博士毕业以后。”笔者也就谨遵师命。毕业后继续从事湖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对这一问题未再提起。曾有某杂志编辑约稿，应以该札记，数年后得知，居然已经发表^①。此次整理书稿，对该

^① 张伟然：《柳毅传书之“洞庭”考》，载《中国地名》1998年第5期，第10页。

文作了全面改写。除了补充资料、详细论证,所涉及问题也有大幅度提升,大体实现了当初向谭先生口头汇报时的想法,可惜已不及请先生斧正了。

本书中最早写成的单篇,是第三章“‘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时为1999年,与当时的研究生林涓女士合作的。那以前笔者曾注意到,文学史界对巫山神女的意象很感兴趣,但从未有人从地理角度加以探讨。而笔者在湖南师大地理系读本科时曾选修过毛政旦教授开设的《山地气候》课,课堂上毛先生经常用其武冈乡音念叨“巴山夜雨”,还在黑板上随手画出多种原理图以示其意,其声在耳如昨。因此笔者邀林涓合作,而她正好少长于昆明,对山地气候有切身感受。该文被《文学遗产》接受后,于2004年发表^①,极大地提振了笔者沿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的信心。

1990年初,笔者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研读资料时发现,《续高僧传》中有与《桃花源记》结构一模一样的故事。故事里的避世者自称避曹魏,而主人公去访问时已是元魏。当时要忙硕士论文,也就没管它。念博士时读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其中主要结论有一点是“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②,很好奇此点是不是受到《续高僧传》的启发。因陈先生对内典无疑很熟悉。但此事甚复杂,加上博士论文工作压头,只好仍将它放下。迁延有年,直到2000年秋,笔者赴日本爱知大学做学术访问,本想趁机将它撰写成文,但尚未开工,李孝聪先生又邀我参加他承担的盛唐工程子项目《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的研究。于是我再次将其放下,集中精力

① 林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20—27页。

②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8页。

撰写了一篇《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①，亦即本书第一章内容。此文于2002年4月杀青，收集资料后写作约花了一整年。之后才腾出手来，将那些桃花源型故事论述成文^②。

在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的过程中，因集中思考“江汉”的问题，曾注意到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少长江汉”。按照对“江汉”的经典解释，那么他应该是湖北人。2003年春，笔者总算得空研读相关资料，然而大失所望。该文的空间逻辑混乱不堪，而且主题游移不定，词句也相当鄙陋，绝对不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基于自身经历而撰写的辩诬雪谤之作，完全是一个缺乏实际经历、对文中提到的地名不甚了了、对李白在安州的具体经历也不甚清楚的想象之作。科举时代一些三家村学究经常训练学生模拟古人作文，此文的性质大抵类是。于是笔者写了一篇《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③。

该文撰成后，曾呈请中文系二三好友指正。承查屏球教授告知，古典文学界向来认为杜诗中“江汉”在出峡前后有两种涵义，出峡前指巴蜀，出峡后指江汉平原。笔者觉得这样的见解不可思议，于是写作了《杜诗中的“江汉”》^④，此即本书第二章首节。复旦古籍所吴冠文博士看到这两篇文章后，发表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质疑》^⑤；于是笔者又撰写了《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⑥。

吴博士大抵还是坚持清人的旧说，认为“江汉”可指巴蜀。她并没有就“江汉”的含义补充论据，却指出了历代文人有将蜀地称作“江

① 载《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307—412页。

② 张伟然：《竹林寺与桃花源——一种本土佛教传说的形成与演变》，载《觉群·学术论文集》第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208页。

③ 载《九州学林》第2卷第1期，2004年，第74—85页。

④ 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第114—121页。

⑤ 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辑，第287—298页。

⑥ 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89—95页。

汉”的传统。由此刺激笔者理清了将“江汉”指称蜀地的空间逻辑。为此要感激吴博士。

2001年,学兄胡阿祥教授策划一套《河流文明丛书》,约笔者承担《湘江》一册。该丛书要求用随笔风格写学术内容,促使笔者对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潇湘”意象作了一番清理。该部分内容亦曾单独发表^①,此次收入本书作了大幅度改写。

第四章是着手最晚,也是写作时间延续最长的。该章从2009年5月开笔,直到今年3月结束,首尾五年。可以说是笔者受学以来写得最艰苦的一篇文章。这五年中当然也做了些其他的事,但种种超出预期的困难是它迟迟不能终篇的根本原因。

该章的初因是对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关于禽言诗的那篇著名长注感到疑惑。他提出禽言是“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笔者想从历史方言地理的角度进行检验。工作展开后发现这完全不是问题,隐藏于其背后的人鸟关系才是要关注的重点。于是复习从大学以后就置之度外的《中国动物地理》,思考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鸟类种群,发现解语鸟禽在中原地区自古就存在。这样一来问题才比较明朗:禽言诗兴起之前,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的诗人之所以未能写出禽言诗,并不是没见过那些解语鸟,而是认为那些鸟鸣根本就不是在说人话。

多亏现在这个拥有电子检索的时代,为资料搜集提供了极大方便。通过对历代禽言诗进行统计,笔者想到可以从解语鸟禽在汉唐间的表现入手,检讨历代诗人对于鸟声判读的变化。这样才算把问题核心给抓住。此后又透过北方诗人对南方环境感知的深入,以及南方诗人受到启

^① 张伟然:《潇湘的意象及历史》,载《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9页。

发后对自身方言优势的发挥,终于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禽言诗兴起的一些关键。并由此检讨了4至10世纪中国文学对环境感知的深入过程。

在第四章主体部分厘清之前,笔者并没有想到要将上述各篇章组成一本专著。当时的想法是先慢慢积累,到合适的时候按主题发展成若干著作。2012年秋,突然间发现,其实以上内容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共同主题:地理意象。于是对各部分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整理加工,组织成一个主体为四章的结构。

本书所谓“中古”并无严格年代界限,大致以唐代为重心,具体到各章节则以讨论所需为度。有些章节基本上就唐代展开讨论;有些章节则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并不强求一律。

“意象”一词在文学界应用很广;自六朝以降,它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①此中“意象”,袁行霈先生认为“显然是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②。鉴于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的含义,也没有一致的用法”,袁先生自己为它给出了一个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③

不能不说,这样的定义稍微有点远。地理学中对于意象(Image)的理解相对较简明,它指的就是客观世界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换句话说,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6,第493页。

② 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见氏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第51页。

③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第54页。

由于对内涵限定较少,地理学中意象的外延似乎比在文学中稍大。地理学者不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人类的环境感知必然要受到其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主观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经过了主观选择;因此,凡地理意象都值得从感知的角度加以研究。

不过相对而言,本书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

现在略陈本书的学术构想。

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